

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研究丛书

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

**A STUDY OF WARLOR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孔凡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研究丛书

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

**A STUDY OF WARLOR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孔凡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孔凡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004 - 9264 - 1

(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研究丛书)

I. ①近… II. ①孔… III. ①军阀—政治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1959 号

策划编辑 卢小生 (E-mail: georgelu@vip.sina.com)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杨 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插 页 2

印 张 18

印 数 1—6000 册

字 数 293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政治发展是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的体现，是一个政治体系从传统政治形态转向现代政治形态的行为和过程。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先生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后认为，一个社会要现代化，政治权威化是关键，这是现代化的第一条件，没有一个权威的政治体系，特别是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资源总量有限而且十分分散的传统社会不可能大规模地推进社会的现代化^①。所以，现代化进程中，当经济发展启动以后，政治发展就成为大规模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火车头。

从明末清初开始萌生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所以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原因就在于政治发展步履蹒跚，从而使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第一条件不充分。

1840年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进程。这种特殊的起点为中国后来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的冲击直接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现代经济的产生，但是，它也使中国社会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之中，现代化资源匮乏，社会分化严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在危机中前行。

中国在“危机现代化”中前行，政治发展布满荆棘、步履蹒跚。在清朝末期，内忧外患迫使中国的有志之士寻找应对之策。但是，这个过程也助推了中国政治精英的分裂。精英分裂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洋务派与顽固派分离，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实现现代化。19世纪末，传统政治精英进一步分裂，君主专制政体遭受质疑，君主立宪派从传统政治精英中分离出来，他们试图通过政治体制改良来走向现代化。但是，传统政治精英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拒绝

^①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改良，戊戌变法失败，体制内改良的道路被传统政治精英所抛弃。20世纪初，科举制的废除对传统政治体制更是带来颠覆性的后果，知识分子通向体制内政治参与的道路被割断，知识分子被边缘化，被迫进行现代化转型，他们与传统社会割裂。与此同时，军人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出现了离心倾向。他们在革命派的领导下会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向传统政治体制提出了挑战，军阀政治初露端倪。

在20世纪初期，革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它是由中国传统社会“全面危机”、精英逐步分裂、政府权威流失、地方权力分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但是没有建构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所以，造成治权的进一步分裂。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言，在辛亥革命之后，“事实上，政治的权力落到了地方总督的手中，这种情况至少持续了十五年。在这一阶段中，在一些重要区域，掌握着权力的贵族要么是转变成军阀，要么和个别军阀联合起来。整个社会和文化中赋予乡绅以合法地位的机构已成明日黄花，乡绅的后代将变成彻头彻尾的地主、强盗，或是地主加强盗，这种趋势早在帝国时期就已潜伏在表层现象之下”^①。所以，即使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民族国家只是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形式，政治制度的一体化还遥遥无期，通过政治整合实现社会整合是中国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旧阶级、旧经济、旧政治和旧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军阀政治显然无法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彻底转型（军阀政治是从传统专制政治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过渡或曰转型形态）。

1928年，国民党建立的党国体制本质上是辛亥革命失败或至少可以说是革命不彻底的产物，当然也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收回了部分主权，政治录用也倾向于现代化知识分子，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满足了现代化最初的和最有战略意义的需要。但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虽然与军阀政府相比，它已经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走了一步，但它并没有大规模地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原因是，与军阀政府一样，它与旧阶级、旧经济、旧政治和旧文化

^① [美]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能力非常微弱。国民党政府是表面上的民主共和政权，实质上的极权主义政权，是城市工商业、金融业和乡绅后裔的联盟政权，其在农村的土地政策无非是力图维护旧有秩序，商业的影响蚕食着农民的所有权，财富高度集中于新兴联盟阶层手中，其无益于农业的商品经济化^①。国民党社会动员能力低下，它的社会动员仅限于农村和城市中的食利阶层，无法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日本的入侵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再一次使国民政府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国民政府的统一是有限的，在南方，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继续存在，军阀势力在地方上仍然限于表面的忠诚。日本的入侵使国民政府恢复主权的努力毁于一旦，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困扰着国民党的政治决策。在党国体制下，国民党垄断了国家权力，它不仅压制大众政治参与，还直接导致国民党政权与民族主义精英的分裂。中国社会的第二次革命不可避免。政治体系的再次革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它是由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力量的刚性结构决定的，即国民党政府如果无法彻底突破军阀政治的框框，政治一体化，特别是政治权威化的政治发展目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第一条件就无法具备。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真正的主权独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一体化的政权体系，实现了治权的统一。从而自1840年以来，中国首次完成了政治权威化的两个先决条件：主权独立和治权统一。但是，不幸的是，政治权威化的两个先决条件是凭借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和运动式的政治统治实现的。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和运动式的政治统治有利于把政治资源集中起来，有利于政治系统的高效运转，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权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也为后来的十年动乱埋下了种子。原因是，政治运动的目的是要将松散的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在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得以集中化或曰一体化，使党的领导贯彻到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各个细胞和单元（单位和个人），但政治和社会一体化的目标需要利用大量的经济资源

^① [美]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142页。

来达成,在当时经济总量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用政治和行政权力集中与利用总量有限的经济资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加上根据地原有的统制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排斥商品经济,采用计划经济就是一种自然的政治选择。而为了为集权的政治和经济博取合法性,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控制或曰一元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当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一元化后,政治和社会精英就会分化,要么认同这种高度一元化,要么抵触甚至反抗这种高度一元化,后者就会与政治体系中认同性政治和社会精英发生矛盾和冲突。在认同性政治和社会精英内部,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人士也逐步认识到高度一元化的弊端,呼吁适当放松控制,于是,认同性政治和社会精英内部也发生矛盾和冲突。上述两种分化和冲突随政治运动扩展到社会大众中,造成大众的分裂。最后导致了政治和社会精英之间、社会大众之间的一场政治、经济、文化大冲突,这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

回顾中国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史,从晚清改革到军阀政治,从民国党国体制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再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中国政治发展一直在挫折中前进,在危急中革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仍没有彻底完成,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政治体系。因为现代政治体系,除政治权威化外,至少还有政治世俗化(结构功能分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等几项指标。显然,这后三项指标在现实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

幸运的是,十年动乱后,从濒临崩溃的计划经济中吸取教训,接受了商品经济理念。从而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比较多元的利益和文化格局。市场经济所蕴涵的自由、平等和契约精神,都为中国政府创新注入了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分化。在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社会也为其他思想文化的输入和生长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政府和社会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从而发展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源。一定的政府自主性比较有利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政府自主性的获得也促进了国家职能的扩张和国家能力的增强。强大的现代政府在中国开始出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政治权威、政治整合和政治民主问题。同时,社会也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公民社会在中国开始萌芽,相对自主的社团迅猛发展。国家和社会朝着二元化方向发展,政府从传统的

“统治型政府”逐渐走向“管理型政府”，21世纪初以来，随着执政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政府日益朝着“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努力。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涌入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结果加大了西方政治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冲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政府治理和法治建设提出了挑战。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支撑。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是国家一体化过程中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政治模式对大陆政治的影响。随着中国收回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一国两制”在中国变成了现实。在“一国两制”下，中国内地的政治体制加强了对香港、澳门的政治影响。反过来，香港、澳门相对独立的、法治和程序民主程度比较高的政治模式也对内地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压力。

无论是国外环境还是国内现状都为中国政府创新注入了动力，提供了机遇和生长空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民主形式不断完善和发展，农村基层选举、公推直选、党代表常任制、民主恳谈机制等政府和政治创新实践开始在中国一些地区展开，这些政府创新和政治改革无疑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希望和未来。同时，这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政府创新和政治改革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为当前国内外政治学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正是认识到这些，我们决定出版《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研究丛书》，力求探讨世界和中国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问题，当然，重点是中国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问题。通过研究世界和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中国政府创新提供启发和理论指导。另外，通过探索中国政府创新，为中国政治发展寻找新的突破口和逻辑起点。同时，把我们这个十多年来形成的学术群体对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领域的学术思考和研究成果奉献给大家，希望能够对党和政府的理论创新及政策制定有所启示，对国内外学者和社会人士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一块引玉之砖。

是为序。

施雪华

2010年8月11日于北师大塔四楼

目 录

导论	1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1
二 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16
(一) 组织的基本问题	17
(二) 组织理论的适用	18
第一章 军阀和军阀政治	20
第一节 语境和语义：三种语境中的军阀观念	20
一 日本学者：“军阀”的现代转换者	20
二 英语国家学者：“军阀”的现代阐释者	22
三 中国学者：“军阀”的创造者和批评者	26
第二节 作为组织的军阀：军人干政和派系集团	30
一 组织的外部效应：军人干政	30
二 组织的内部特征：派系集团	32
第三节 军阀政治：特征和边界	35
一 军阀政治的特征	35
二 军阀政治的边界	40
第四节 过渡性的政治：军阀政治之定位	45
一 现代化之维：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之间	45
二 政体之维：在君主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	48
三 权威之维：在权威原子化与权威一体化之间	52
第二章 中国军阀政治的起源	56
第一节 地方主义和武人文化：军阀政治的传统资源	56

一 地方主义：从地域差异到乡域情感	57
二 武人文化：文官治理下的暴力潜流	62
第二节 新军、军事改革与军阀组织的诞生	66
一 王朝危机及其后果	68
二 军事改革与军事现代化	70
三 从军事现代化到军事政治化	77
第三节 现代化、权威危机与军阀政治的形成	81
一 现代化与君主政治的崩溃	81
二 权威危机与政治军事化的合法化	85
三 权威崩溃与军阀政治的形成	88
第三章 私人链条、等级效忠和派系化	92
第一节 传统的庇护纽带	92
一 血缘关系	93
二 师生关系	95
三 地缘关系	97
四 主辅关系	99
第二节 等级效忠的领导体制	103
一 我下级的下级不是我的下级	103
二 派系化的内部结构	108
第三节 军政关系	113
一 中央政府中的军政关系	114
二 军阀组织中的军政关系	115
第四章 双重效应：政治衰败和政治发展	119
第一节 战争角逐和军事现代化	120
一 军事技术的现代化	121
二 军事体制的现代化	123
三 军人的现代化	125
第二节 秩序崩溃和有限秩序的重建	128
一 暴力秩序	128

二 有限秩序·····	130
三 分散治理·····	133
第三节 军人主导和传统社会的解体·····	136
一 打击皇权·····	137
二 破坏传统官僚制·····	141
三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142
第四节 组织缝隙和现代政治的成长·····	146
一 政治录用的现代化·····	146
二 公民社会的萌芽·····	150
三 政治文化的转型·····	153
第五节 军人干政和宪政的失落·····	154
一 宪政虚化·····	155
二 宪政失败·····	156
第六节 政权分裂和主权的危机·····	158
一 政权的分裂·····	158
二 主权的危机·····	159
 第五章 中国军阀政治的基本规则·····	163
第一节 第一规则：生存的绝对命令·····	165
一 自然模式与生存本能·····	165
二 生存手段之一：扩充军队·····	168
三 生存手段之二：控制地盘·····	170
四 生存手段之三：汲取财税·····	173
第二节 第二规则：暴力是政治裁判者·····	179
一 军事力量决定政治权力·····	180
二 战争暴力解决政治冲突·····	183
第三节 第三规则：权力均势·····	185
一 从平衡到不平衡·····	187
二 从不平衡到平衡·····	189
三 变动的权力均势·····	190

第六章 代理人抑或自利者：军阀组织与帝国主义	195
第一节 阶级分析法和代理人说	196
第二节 滤网型边界和军阀组织的依附性	200
一 军阀组织的滤网型边界	201
二 军阀组织对帝国主义的依附	205
第三节 组织自主和对帝国主义的拒斥	209
一 军阀组织的自主性	210
二 军阀组织对帝国主义的拒斥	213
 第七章 中国军阀政治的终结	218
第一节 军阀组织的缺陷	219
一 组织的传统局限	219
二 意识形态的贫困	223
三 暴力竞争的集体自杀	228
第二节 军阀政治的“敌人”	231
一 政党组织的崛起	232
二 民族主义的高涨	235
三 现代知识分子的兴起	238
四 党军组织：军阀政治的终结者	242
第三节 军阀政治的终结	245
一 终结的渐进性	245
二 终结的遗产	248
 参考文献	254

导 论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中国学者对中国军阀政治研究在军阀混战时期就已经开始。国外对中国军阀政治的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外学者为军阀政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通过对中外学者军阀政治研究的主要视角的考察,可以客观地反映中外军阀政治研究的动态以及不足,从而为中国军阀政治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寻求新的方法论和突破点。

(一) 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法主要是中国大陆学者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毛泽东、胡绳、来新夏等。他们认为,军阀在中国近代政治中承担着双重角色——代理人和代表者。军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政治代理人。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①在国内,军阀则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②对于中国军阀政治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和国际环境决定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③胡绳也认为,军阀政治所导致的混乱、战争是帝国主义矛盾在中国的反映。“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两个武器——武力与财力。他们用这两个武器支持他们的代理人,反动军阀统治者;也用这两个武器压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8页。

② 同上书,第127页。

③ 同上书,第49页。

迫中国的人民和阻挠中国的革命。”^① 来新夏先生是中国北洋军阀史研究的佼佼者。他和其学生共同编著的《北洋军阀史》堪称当世杰作。来新夏先生在这本书中所体现出的分析方法也是阶级分析法。不过，他对军阀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军阀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阶级属性。他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的社会基础。它的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② “军阀们通过土地榨取地租，投资获得利润，又以所得进行高利贷剥削和购置土地。这三者的资金相互转化、增殖，使这批人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一定时期进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带有某些资产阶级色彩。这就是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它与旧的封建性军阀的主要分界点。”^③

在中国大陆，阶级分析法是研究中国军阀政治的主导框架。这种分析方法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矛盾的观点来解释军阀政治的产生、冲突和终结。从中国政治的宏观层面上看，阶级分析法具有说服力。

（二）军绅关系

军绅关系分析模式是由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系、中国和日本近代史教授陈志让提出的。军绅关系中的“军”是指1895年以后渐渐发展的军队，“绅”（缙绅、士绅）是指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陈志让认为，1860—1895年是绅军政权，1895—1949年是军绅政权。军绅政权就是军阀政治的核心本质。陈志让认为，军绅政权有五个特征：（1）军人领导绅士；（2）近代民族主义觉醒时代；（3）不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4）权力分散；（5）财政自立。陈志让认为：“这个新兴的军—绅政权之所以不能统一中国，一方面是派系的分裂，另一方面是地区的分裂。派系的分裂象征着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地区的分裂象征着既得利益不能调和，养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我们认为要了解军阀时期的政治问题必须集中深入地分析地区的分裂和派系的分裂。”^④ 以现代化作为评判标准，陈志让对军—绅政权的评价

①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99页。

②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③ 同上书，第21页。

④ [加拿大]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9页。

基本上是消极的。他指出：“它造成中国政局的不安定，破坏和阻挠交通运输，摧残中国的教育，搅乱中国的货币制度。在它统治期间，中国新式工业的进步跟军—绅政权毫无正面的关系。”^①但是，陈志让不赞成关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间的主奴关系论。他指出：“在缺乏确切的证据的情形下，与其推测军阀是否甘心作帝国主义的走狗，不如从他们的行为和政策来说明他们是否是民族主义者，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者。”^②

陈志让的军绅关系模式相对于阶级分析法来说是更进一步，它能够从更微观的层次来阐释军阀政权的特性。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问题。根据麦科德的研究，军绅同盟只是在民国最初几年存在，但是政治军事化结束了他们的同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陈志让把军阀政权描述为‘军绅联盟’似乎并不恰当。在民国初年，省政权当然是被文官和军事精英所组成的联盟控制。然而，军事将领的利益从先前文官同盟中分离出来，政治军事化结束了这种伙伴关系。”^③另外，军绅关系模式把军绅政权和党军政权混淆在一起。在蒋介石政权里，它已经确立政党领军模式。与军绅政权相比，党军政权的文武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现代化理论

运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军阀的代表人物有费正清、派伊（Lucian W. Pye）等、罗兹曼。费正清认为，军阀政治的产生是中国现代化不均衡发展的产物。“这种平衡的改变，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职政府权威和价值观念的瓦解，同时军阀部队新的军事技术能力、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强的火力也未得到相应增长的新型政治体制的制衡。这当然已经成了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物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民参政率的提高。从这方面看，军阀混战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中国的旧传统，而是一种近代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军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能够控制它们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规模。”^④

① [加拿大]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60页。

② 同上书，第162页。

③ Edward A. Mccord, *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276.

④ [美]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02页。

派伊也是运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军阀政治。他认为，中国的军阀政治是中国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一个方面。^① 派伊认为，军阀政治在中国的发生是因为社会价值变迁与权力组织变迁之间的脱臼，以及现代化所带来的权威危机。他指出，“中国经历了一个政治变迁的脱臼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政治价值方面，私人的利害关系的传统模式继续拥有力量；而在权力分配领域，趋势是走向更开放的竞争，在这种意义上是走向更现代的政治形式。由此看来，军阀代表着价值层面的延续和权力组织层面的中断。”^② “从以上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对军事化的组织有特殊偏好：原因在中国近代史上，军队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帝制时代的官僚体系崩溃之后，唯一有力量控制全局的就是军队，同时，军队本身就具有建立大规模组织的能力。”^③ 不过，与费正清看法不同的是，派伊给予了军阀政治相当正面的评价。他指出，“军阀及其政治代表着所有的错误的时代，他们的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转型阶段。他们的权力依赖于这种现实：他们占有着仅有的能够寻求政治权力的组织。然而，这些组织不是通过根据政治目标而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没有明确代表既定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的特别部分。因而，以前的政治的私人形式继续存在。军阀寻求的价值首先是私人价值。政治生活的纽带和联盟也是建立在私人联系基础上的。然而，军阀及其组织是中国社会的权力组织和分配的基石。严格说来，他们代表着革命性的进步，标志着一元化和等级化的权力结构向更分散的权力分配的转型。权力问题当时在中国变成了更开放和更有竞争性了。”^④

罗兹曼从现代化角度，对军阀政治的评价是比较中庸的。“军阀对中国政治的改造，对于当时中国总体社会正在经历着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既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建设性的一面。旧的模式

① Lucian W. 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p. 6.

② Ibid., p. 9.

③ [美] 派伊《中国人的政治文化》，胡祖庆译，（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④ Lucian W. 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p. 9.

使许多人不得不去寻求和相信新的选择。在军阀主义的鼎盛时期，知识界变得最为激进，正在打倒一切偶像……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整个知识界陷入了极端的怀疑主义、全盘否定和彻底革新的心态。知识的探索大部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并到中国的历史遗产中去挖掘现时代价值。各种政治理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扩大，包括了大量新式西化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出洋，以寻求中国教育似乎缺乏的那些具有特别的实际应用价值的东西。大多数人后来回国，希望在政府中找到工作。国家的领导者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把注意力集中于寻求中国的国际尊严和政治稳定。”^① 虽然中国军阀政治时期的现代化仍然向前迈进，但是以政府瘫痪为代价的。“然而，在这个时期，现代化事业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最明显的就是军阀主义造成政府瘫痪。”^②

现代化理论从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出发来解释军阀政治问题。它也是一种宏观的分析模式。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所能解释的也只是军阀政治所处的历史背景。它的缺陷在于没有深入到军阀组织的内部来解释军阀政治的特征。

（四）权力均势

权力均势理论模式是由齐锡生教授提出的。齐锡生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的军阀政治》一书中，运用国际著名政治学家凯普兰教授的“范型”理论，在“权力均势”和“角色行为规则”的方法原则指导下，对中国军阀政治进行了系统的、动态的宏观分析。齐锡生认为，1916—1928年间，中国的政治派系在某些方面非常类似国际关系，军阀组织要遵守权力均势的逻辑：（1）要增长力量，宁可使用谈判也不取战争方式；（2）宁可战斗而不放过增长力量的机会；（3）宁可停止战争而不要消灭一个重要角色；（4）反对派系内部有可能占统治地位的任何联盟或个人；（5）要限制那些主张超国家组织原则的行动者；（6）允许打败的或被限制的重要角色作为受欢迎的合作者重新加入派系，或把某些以前的不重要的角色划进重要角色的行列，把所有重要角色都作为受欢迎的合作者^③。齐锡

① [美]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3 页。

② 同上。

③ [美] 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4 页。